

编者按

今年“七一”是党的101岁华诞。回首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英雄不朽，精神永存。本期《口述》版特邀两位革命后代追忆母亲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曾志之女陶斯亮：

## 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是母亲对我的希望



曾志

■ 口述：陶斯亮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人物简介

曾志，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1911年4月，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陶斯亮，曾志的女儿，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1994年，曾志与陶斯亮(右)在松风石前合影

我又一次梦见我的母亲，她的笑容依然那么温婉，目光依然那么坚毅。我很感激这期不期而遇的梦，让我在回忆中享受母亲带给我的温暖与力量。

### 一生看重“共产党员”这四个字

母亲去世的时候，正是暑气渐浓的六月，她走得很安详，她用颤抖的手在遗嘱上写完她的名字后，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母亲的名字虽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是对她而言，曾志这个名字承载了一名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追求和自我革命精神。

1926年，母亲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入党，并如愿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从此开始了她的血雨腥风、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之后，她把自己的名字曾昭学改为曾志，一个争做有志气的人。她用生命谱写忠诚，把理想付诸实践，她的

名字也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句话，是她一生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她一生看重“共产党员”这四个字，不忘入党时庄严许下的誓言，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参加革命后的母亲，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曾经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下工作，生死对她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党的事业竭尽全力，因为党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

令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千里寻党的故事。1935年春，闽东苏区失陷后，母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历经20个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尽管她也遭受多次处分和政治审查，其中有不少委屈，但她初心不改，舍生忘死为党工作。

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根本没有任何特权思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石来发，她也不动用手中的权力安排工作，而是鼓励石来发回到井冈山当农民，甚至铁面无情地拒绝了孙子石金龙户口“农转非”的要求。解决孙子们吃商品粮问题，对母亲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也曾问过一向热心助人的母亲，为什么不帮助自己的孙子呢？母亲说当年干革命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能得到一块田地，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对于母亲这样的回答，时间已经证明当初母亲的抉择，如今我大哥哥四周是广阔的稻田，屋前有一口池塘养着鱼和鸭，好似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画，很多亲朋好友去过我大哥哥家后，无不羡慕那里的山水田园，美丽的乡村生活令人向往。或许侄儿们也能感受当初奶奶的决定是多么睿智吧！

用母亲自己的话说，她只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那么多好同志、好战友、好朋友都倒在了血泊里，她却三番五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运地活了下来。她不能忘也不敢忘那些曾与她休戚与共

的老百姓。与那些年轻的捐躯者相比，她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太多太多，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都是罪过。

她病逝前，让我从她的80只信封(工资袋)中掏出了几元现金，并嘱咐我一定不要扔掉那些信封，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每一笔都是她的清白的辛苦钱。母亲向我口述了她的遗嘱，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子女们不得分她的这些钱。她要将钱交给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以及留作老干部活动基金，再留一些做出版物的回忆录之用，去世后丧事从简，遗体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广州白云山下，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松柏树下。

确定无误后，母亲才用颤抖的手，签了她一生中最后的“曾志”二字。平凡又伟大的母亲，就这样悄然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回望母亲走过的87年人生之路，让我不得不感叹，母亲一生都在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七十年的党性锤炼，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她一生都在保持着共产党员本色。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这是我写在她挽联上的一句话。在母亲离世的这二十多年里，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见她，梦里梦外，她从未在我的人生中消失过。每每回想起母亲的一生，触动我的永远是对党对祖国对人民那份深沉的爱，她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一直激励着我，是我一生追寻学习的榜样。

### 在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作风中感受母爱

我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长大，从小就经历了与父母别离的生活，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父母亲准备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我被留在了延安，由八路军老战士杨顺清照顾我长大。从我记事起，耳边的炮火声、急促的防空警报声时不时都会响起，或许正是自己的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敬佩英雄、敬畏生命。在我后来读大学时，我毅然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父母亲也认为，医学是一门技术，能够真正为人民做点实事。

我真正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父亲陶铸含冤去世后。我和母亲朝夕相处了28年，在这28年，耳濡目染母亲的教育，她从来不会主动要求你做什么，或许是长期的革命生涯，特别是险恶的秘密工作环境，使她养成了不轻易流露感情的性格。所以我和母亲在默契中传达着感情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当面对她说过类似“妈妈我爱你”的话，但是无形中，母亲的一言一行都感染着我。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母亲每花一笔钱就要在账本上详细记录，从来不含糊。一年四季，她几乎不会给自己添置新衣服，都是三四件衬衣轮换洗，她的茶杯是没有把手的，一个牙刷也要用很久，梳子掉了梳齿也坚持用，从来不会用什么护肤品，从来不倒掉剩饭剩菜，都要全部吃完。有一次，母亲坐公交车去购买生活用品，其实她也可以坐公家的车，但是她从来不会享受本应该享有的待遇，没想到那次她坐公交车出了事。那时候公交车秩序较乱，大家都在蜂拥而上，母亲比较弱小，被挤在公交车门外，头部被车门夹住，被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在生活中，我们家像大多数家庭一样也会有代沟，也经常磕磕绊绊。代沟主要是在生活态度与方式上，比如我一开始不太理解，母亲明明可以不挤公交去购物，非要挤公交挤出个脑震荡。但是，我后来渐渐理解了母亲骨子里的艰苦朴素、清正廉洁。

我的儿子有次在餐桌上说：“妈妈总是把好肉夹到我的碗里，我总是把我不想要的下意识

地给姥姥，姥姥总是特别自然地就吃了！”儿子的话轻描淡写，却表达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关系。

对物质生活淡泊的母亲，却对精神信仰非常执着，这种巨大反差就是母亲品格上的最大特色。我把困难、挫折或者委屈告诉母亲时，她回赠给我的永远只有一句话：“你是共产党员，你干的是一番事业，而不是为某个人干的，因此不必在意某个人对你怎样。”

受母亲的影响，我在24岁那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年轻时就树牢了道路自信，深深牢记党的教导，认准了目标只管前行，从来没有迷失过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如今，“不亢不卑、宠辱不惊”成了我的座右铭。

### 发扬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

回首这一路走来，如今我已80多岁，这一生虽然历经许多坎坷，但感觉自己已是幸运和幸福，生活得无怨无悔。我当了20多年的医生，做了30多年的慈善，50岁时到成立不久的中国市长协会任职，同时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职，创建了爱尔兰公益基金会，在中国市长协会一待就是24年，直到74岁才退休。

在做慈善工作时，祖国的边远地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先后发起了“智力工程”、东乡扶贫助学行动、“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向日葵计划”等多个公益慈善项目。迄今为止，我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筛查了上千名脑瘫患儿，累计救助近400名脑瘫患者。

或许有人好奇，我后来为什么一直从事慈善，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特意就接触慈善，但是在做慈善时，我感受到奉献就是一种快乐。

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在解放军第七医院当医生，被派遣到甘肃临夏的一所医院工作，在那里待了三年，我经常一个人下乡去征兵体检。那時候的东乡县城，整个县城就是几间泥坯房，夹着一条黄土翻飞的公路。当我为大约100多名东乡征兵青年做完体检后，发现东乡体检的青年不合格，主要还是发育不良，身高体重达不到标。当时的东乡无论是环境，还是老百姓生活都非常艰苦，这很触动我的内心，这无形之中也促进我后来从事公益慈善工作。

我前前后后去了很多次临夏，2000年，我邀请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夫妇、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吴青到东乡考察教育扶贫，之后连续几年带女市长们去做“手拉手助学活动”，让东乡的女孩们能上得起学。

回想当初1968年，我第一次到东乡县看到的那一幕，与如今东乡风貌相比，那简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东乡的变化只是国家繁荣富强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

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是母亲生前对我的希望。我会继承母亲乐于奉献、淡泊名利的精神。我奉献，我快乐！只要自己身体允许，我会永远助人行善。

■ 口述：陈宜生 ■ 记录：胡山



彭儒

人物简介

彭儒，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女战士之一，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干部，1913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碣石村，14岁参加革命，1930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陈宜生，彭儒之女，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电子工业部干部，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局处长，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退休后任井冈山女联谊会首任会长，全国红军小学工程建设理事会常务理事。

彭儒之女陈宜生：

## 红军妈妈的革命品格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 母亲和彭家姐妹们打出了“彭家女将”威名

1936年，我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碣石村，一年多后父亲和母亲先后离开碣石奔赴延安。我再到他们，已是13年后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陈正人的身份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和江西军区政治委员。母亲彭儒是最早的女红军之一，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井冈山红军。她的革命品格，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

碣石村是一片红色热土，大批仁人志士苦苦寻觅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彭家儿女纷纷投身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革命洪流。母亲跟随彭家姐妹们在农军和革命军攻打反动派占据的重镇黄沙堡等军事斗争中，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打出了“彭家女将”的威名。

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之后，除一批优秀革命骨干留在碣石和宜章继续坚持斗争外，碣石村有167位优秀儿女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1928年5月4日，江西宁冈县龙市镇举行庆祝“朱毛会师”的联欢会。母亲年纪虽小，胆子却很大，为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她大胆地上台表演了“葡萄仙子”独舞，演唱了湖南民歌。两军会师井冈山以后，打了许多胜仗，红四军第29团战斗英勇顽强，团里的众多碣石彭家英雄儿女打仗是英雄，搞宣传是能手，做群众工作是模范，被大家称赞为“红四军中彭家将”，成为红军初创时期第一个英雄模范群体。

### 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克服一切困难

每每看到墙上慈爱母亲的照片，我都为她容貌中透露出的坚毅神色所感染。那是一位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坚定信念的战士特有的气质。母亲出身开明乡绅之家，早年与同族兄长姐姐

们在湘南学生革命运动中心——衡阳三师读书，走上革命道路。1928年秋，母亲任湘赣边界特委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与吴仲廉、曾志并称“井冈山妇女运动三杰”。

我每次登上井冈山，脑海总是浮现出父辈在这里的战斗岁月。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彭德怀部800余人、红四军32团王佐部600余人和父亲领导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当时，怀有身孕的母亲与父亲摆脱敌人追赶后转入深山老林，隐藏在老乡晚上防野猪守山的草棚里。那年冬天井冈山连下40多天大雪，父母饥寒交迫。他们四处寻找党组织和群众，鼓励大家坚持斗争。母亲严重缺乏营养，常常晕倒。但她休息一下，又坚持起来为游击队员们洗衣、缝衣、烧水。

有一个晚上，他们在一片被敌人烧毁的房屋废墟中找到了一点烧焦的谷粒。他们异常高兴地把这些烧焦的谷粒一粒一粒地捡回来，用手慢慢搓出米心来，放点野菜，烧了一锅汤来充饥。由于长时间吃不到盐，他们腿软心慌眼花。最难熬的夜间，他们躺在一层杉树皮上，盖着一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瑟瑟寒风从草棚缝隙间钻进来，就像睡在一个大冰窖。在坚守井冈山的40多个日日夜夜，母亲和同志们浴血坚持，与敌人誓死周旋，是最后撤离的红军将士。

母亲在战争年代参加过不少战斗，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母亲心中，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 传承母亲和彭家将英烈们的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全身心投入国家发展建设事业，经常深入基层第一线，干劲十足，任劳任怨，1960年当选为首屆“全国三八红旗

手”，时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亲自把奖状颁发给母亲。

离休后母亲心系家乡，先后三次回到宜章，和老革命家们一起从事协助申请国家拨款修建湘南起义纪念馆等大量工作，不遗余力地为家乡老区和公益事业呼吁奔走。母亲常对我说，她是代表革命烈士们为家乡人民做事。母亲平时省吃俭用，但为公益事业总是慷慨解囊。母亲临终前10年用于捐助赈灾、希望工程、烈士子女等支出33万多元，临终之际又把仅有的5万元存款交了最后一次党费。

母亲很怀念“彭家将”英雄儿女。她说：“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但共和国的旗帜上有着他们的鲜血，人民军队的战旗上永留着他们的精神。”“我希望能将他们的英雄事迹进一步地给予宣传，以告慰先烈在天之灵，让他们的精神永世长存。”

我真认真学习并努力传承母亲和彭家将英烈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国红军小学工程建设理事会的领导下，从2012年开始积极牵头协调，先后组织在遂川、宜章碣石、莽山瑶族、四川通江川陕革命根据地等老区创建了七所红军小学，与兄弟姐妹一起积极为红军小学捐款捐物，心系老区，关心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为了了却康克清妈妈生前的心愿，我和井冈山儿女们一起协调昌吉赣铁路在革命老区万安开设站点，帮助遂川等井冈山市县争取到渝长厦高铁设站支持老区建设，协助地方政府争取到国家立项建设莽山大中型水库，可以解决30多万老区人民的饮水

灌溉用水问题。我和兄弟姐妹也遵循母亲遗愿，参与整理编辑出版革命史料《碣石彭家将》，筹拍影视作品，宣传弘扬革命精神。

我已经86岁高龄，精力和身体状况也不如从前，但母亲和她那一代英雄先辈们的事迹和奋斗精神时时感染、鼓舞着我。我没有时间放松，没有理由懈怠，一定坚持下去，努力向革命先辈们看齐，尽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和义务，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彭儒前排中(左)与女儿陈宜生(前排左一)家人合影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